

雅典娜思想译丛

黑格尔 康德 韦伯 汤因比等62人 著

何兆武 柳卸林 主编



印象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印象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黑格尔 康德 韦伯 汤因比等 62 人 著

何兆武 柳卸林 主编

(下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ерии

Виталий Чернявский

Обложка: дизайн—Д. Захаров

Верстка—А. Панов

© Текст. Оформление. Разработка
серии. ТОО"Гей". 1996.

© П. А. Судоплатов, 1994.

我社已获俄罗斯著作权协会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中文简体字本出版发行本书。未经许可一律不许以其他形式出版或摘录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魏小明 陆柏春 游凯军

常兆裔 余永寿 李 伟 译

徐锦栋 王世福对本书部分章节进行了校订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1580

目 录

〔英国〕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1)

论印刷、火药和磁石的发明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8)

中国的科学进步为何如此缓慢

为什么欧洲的白银往中国流动?

弃婴对中国的早婚习俗的影响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12)

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中国和印度金银价值高于欧洲的原因

中国轻视对外贸易

中国制造业不发达的原因

其他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21)

论中国人口的控制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36)

论中国皇帝

论中国科举制度

弗雷泽(Sir James C. Frazer, 1851—1941) (40)

中国的民俗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50)

论中国文化

弗赖(Roger Elliott Fry, 1866—1934) (52)

中国的艺术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61)

论中国语言文字对中国文明的影响

论孔子和老子——两位伟大的中国导师

论中国官吏制度

关于中华帝国同罗马帝国兴衰的比较

论中国智慧受束缚的原因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81)

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

中西文明的对比

中国人的性格

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1962) (109)

中国和西方的比较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118)

文明的自我中心论和东方不变论

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

复古主义

近代中国文明

中国的官制

东亚的任务

中国与世界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139)

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贝尔纳(J. D. Bernal, 1901—1971) (166)

中国的科学

[比利时]

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 1917—) (169)

中国思想对世界的贡献

〔俄国〕

- 托尔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 (172)
- 中国的变革与中俄关系
- 中国人不应当模仿西方民族
- 日记中有关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的材料

〔美国〕

- 爱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 (184)
- 致赵元任的一封信
-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186)
- 中国和日本的差别
- 中国的联邦主义
- 白壁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200)
- 浪漫主义与东方
-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206)
- 西方的科学基础和中国古代的文明
- 对上海的印象
-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 (209)
- 中国的文化
- 诺斯罗普(F. S. C. Northrop, 1893—1992) (217)
- 儒家与道家的思维方式及审美
-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246)
- 中国
- 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 1913—) (259)
- 农民、地主、官僚阶级与农业、商业
- 默顿(Thomas Merton, 1915—1968) (274)
- 庄子之道
- 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 (291)
- 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

〔日本〕

福泽谕吉(Yukichi Fukuzawa, 1834—1901)…………… (309)

中国文明开化不可期
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中日文明的某种差异
儒学与佛教共同的弊病

桑原鹭藏(Shitsuzou Kunwabara, 1870—1931)…………… (318)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

铃木大拙(D. T. Suzuki, 1870—1966)…………… (337)

中国的“无心”思想
佛教思想在中国

江上波夫(Namio Egami, 1906—)…………… (349)

8世纪的欧亚大陆

中村元(Ten Nakamura, 1912—)…………… (363)

论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意义

〔印度〕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377)

讲演录

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 1888—1975)…………… (382)

论孔子
人本主义的不足
关于道教的一般评价
中国的佛教

巴克奇(师觉月, Prabodh Chandra Bagchi, 1898—1956)…………… (409)

道家与印度思想
中国与印度

〔以色列〕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1923—)…………… (420)

中华帝国的文化取向和适应性变化

附录 …………… (437)

[英国]

培 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早在 1270 年,英格兰哲学家罗哲·培根(Roger Bacon, 约 1214—1294)就讨论过火药。但最早高度地评价了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项发明对人类历史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使中国四大发明广为世人所知的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培根 1561 年 1 月 22 日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在官场生涯中,他历任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大法官,多次受封。在 1621 年培根被控受贿,经判决,被免除一切官职。此后,培根潜心从事著述。1626 年因病去世,终年 65 岁。

虽然培根一生大半时间在官场度过,但他一直钻研学问,成为近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说文集》、《论古人的智慧》。1620 年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出版,其主要部分即为著名的《新工具》。他在哲学上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恶习,

号召人们从盲目信从权威中解放出来。他是归纳逻辑的主要创立者。在科学上他强调惟有通过实验,才能发现一切现象的原因和规律,他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这里所选的是他的著名著作《新工具》中的几节。在这几节中,培根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都改变了。但培根并不知道这三个发明都来自于中国。

论印刷、火药和磁石的发明^①

希望的另一论据可以由这样一点抽得:有些已知的发明在其被发现前是很难进入任何人的头脑而为人所想到的。它们总是被认为不可能而遭搁置。因为人们凡在构想会出现什么时,总是把曾出现的东西摆在面前作样子;凡在预度新的东西时,总是出以先被旧的东西所盘踞、所染过。形成意见的这种方法是很谬误的,因为从自然这一泉源所发出的水流并不是永远束在旧的槽道里面来流的。

举例来说,在发明大炮以前,假如有人从它的效果上来描述这东西,说有一种新的发明能在远距离外撼动以至摧毁最坚固的碉楼和城垣。人们听了,必定首先就想到炮弩和其他机械,想用一切方法,想用能撞击能发射的重物、轮盘和类似的机器来加倍想像它们的力量。至于说会有一股带火焰的疾风,猛然而暴烈地发出并

① 题目系编者所加,选自培根《新工具》(*Novum Organum*),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卷,84—87页,102—104页。——编者注

爆炸起来,这个想法就很难进入任何人的想像或幻想,因为除地震和闪电而外,人们从来不曾见过与这东西直接相仿的事物,而地震和闪电则是自然的伟作和神奇,为人所不能模拟,于是这个想法就径直被人们排拒掉了。

同样,在发明蚕丝以前,假如有人说,有一种线发明出来了,可以供衣着和铺陈之用,比麻线和毛线都精得多,结实得多,也美观和柔软得多,人们一听,必会首先直接地想到某种丝状的植物,某种走兽的较精的毛,或是某些飞禽的羽片和绵毛。至于说是一个小小虫儿所作的茧,这种小虫又是如此之多,并且是一年一度重生起来,那无疑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的。甚至,即使有人说到什么小虫,人们必定还要加以嘲笑,又认为他在梦想一种新的蜘蛛网呢。

同样再说一例,在发现磁石以前,假如有人说,某种工具业经发明,能够用来精确地观察和辨认天体的部位和方向,人们听了,一定是听其想像所至作出各式各样的构想,想到一些天文仪器的更精巧的构制。至于说能发现出一种东西,其运动悉合于天体但本身却非一个天体,而只是一种金属或石类的质体,则他们必断为是完全不可信的。上述三种东西以及类似的东西,自有世界以来多少年都是隐而不显,而其最后之被人发现亦非由于哲学和理性的方术,而是出于偶然和机遇。这是因为,如我在前面所说,它们与以前所知的任何东西是种类完全不同,相去非常之远,所以人们就没有一种预先存想的概念可能导致它们的发现。

这样看来,我们就有很多的根据来希望,在自然的胎宫中还贮有许多极其有用的秘密东西,与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都不贴近,也无可比拟,而完全处于人们想像的熟路之外,迄今尚未被发现出来。无疑,在此后若干年月的行进和运转当中,这些秘密迟早亦要同其他已经现出的东西一样自行显露出来。不过若是使用我们现在所论的方法,我们就能迅速地、痛快地、同时一齐地把它们引现

出来和提前促成罢了。

还有属于另一种类的发现尚待指出,它们证明着有许多高贵的发明可能就在我们脚边,而人们却踏过而无所见。尽管在火药、蚕丝、磁石、糖、纸以及类此等等的发现方面看来是有赖于事物自身的以及自然的某些性质,说到印刷这个方术方面,无论如何总没有什么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了。但是就在这里,由于人们没有见到:排版虽比手写较难,但二者却有一种区别,即一版排出可有无数印本,而手写则只能有一本;也或者又由于人们没有见到:墨水可以浓化到能印而不流(在字型朝天由上下印时更是如此)——我说,只是由于人们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就空过了这么久的悠悠岁月,而没有做出这一大有助于传播知识的最美妙的发明。

在这一种发明的进程中,人心方面有着这样一种别扭情况和不妥当的根性,开始是不信赖它自己,随后又蔑视它自己:起初不相信任何这类事物能被发现,既经发现以后则又不能理解何以人世与它迷失如此长久。正是这一情况本身大可取作希望的又一论据。这就是说,还有大量可以发明的东西剩留在那里,不仅可用那些尚待发现的做法,就是借助于上文所说的“能文会写的经验”来把那些已有的做法搬运、比较并应用一番,也能把它们推演而揭露出来。

希望的根据还有一点也不可略而不论。让人们但想一想他们在效用远差、价值远低的事情和业务上对于理解力、时间以及资料的无限耗费吧。只要把其中一小部分移用于健全而坚实的研究,就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了。加论这一层,我想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明白地承认,要照我所设想的亦是它所应有的样子来集成一部自然史和实验史,确是一件伟大的,亦可说是庄严的工作,而且也是需要很多劳力和费用的。

同时,人们切不必因特殊东西之繁多而感惊慌,却正应以此来鼓励自己的希望。方术所从事的和自然当中所有的特殊现象诚然繁多,而人的智慧在脱离了事物证据时所虚构出来的东西则更多得多。再说,前一条路像在广场上明设标的,而且并非遥远;后一条路则绝无标的,而只有无尽的纠缠。人们一向都只和经验短接触,都只把经验轻轻撇过,而在智慧的沉思和索解上面所浪费的时间则属无限。其实,如果有人真能以此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并在每一情节上都能告诉我们自然中的真相是什么,那么一切原因和一切科学的发现便应是短短几年就能完成的工作。

说到这里,只有再就心目中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略谈几句了。这些话若在早先说出,或许被看做空疏的愿望。现在希望既经鼓起,不公正的成见既经消除,再说这些话也许就有较重的分量。再说,假如我自己业已把一切做完,而没有机缘再邀请别人来帮助和参加这个工作,那么即到现在我也仍要避免说这些话,以免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但是由于我要促进别人的努力和燃起他们的热情,那么我就该使人们留心到某些事情,这却是适宜的。

首先要说,引进著名的发现,这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应该高居首位,这是历代前人所作的评判。历代对于发明家们都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类此等人)则至高不过溢以英雄的尊号。人们如正确地把二者加以比较,无疑会看出古人的这个评判是公正的。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

再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正如诗人说得好:

脆弱的初民不知道耕稼,
雅典人首先播种真伟大,
从此生长出油油的田禾,
再造了我们下界的生活。^①

说在这里,可以指出所罗门(Solomon)确有值得称道之处。虽然他在统治帝国方面,在金银财富方面,在丰功伟业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舰队武备方面,以及在名耀海内敬在人心等等一切方面莫不显示其伟大有力,可是他都不把这些引为光荣,却只说道:“上帝的光荣在于藏物,国君的光荣则在于把它搜出。”^②

其次一点,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③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而这个差别却是从何而来呢?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方术。

复次,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

① 卢克吕夏斯(Lucretius),公元前约95至公元前31年,罗马诗人,作了一首题为De Rerum Natura的哲学训言诗,凡6卷,倡无神论和唯物论,这里所引的几句见于第6卷1至3行。——译者注

② 见《圣经》,箴言第25章第2节。

③ 克钦注明,这是引用开希里阿斯(Caecilius)的一句箴言,可是培根把它的原意扩展了。——译者注

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进一步讲，我们不妨把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也可说是三个等级来区分一下。第一是要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野心是鄙陋的和堕落的。第二是要在人群之间扩张自己国家的权力和领土，这种野心虽有较多尊严，却非较少贪欲。但是如果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是比前两种较为健全和较为高贵的。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靠方术和科学了。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再说，既然人们把某种个别的发现尚且看得比那种泽及人类的德政还要重大，那么，若有一种发现能用于工具而便于发现其他一切事物，这又是何等更高的事啊！还要以光为喻来说明（完全说真的），光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相互辨认，其功用诚然是无限的，可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比它的那一切功用都更为卓越和更为美好。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要更有价值，只要我们的思辨是如实的，没有迷信，没有欺骗，没有错误，也没有混乱。

最后再谈一点，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的目的为理由来加以反对，请人们也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因为若是那样说，则对人事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气、力量、美丽、财富、光本身以及其他等等也莫不可同样加以反对了。我们只管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所遗赠，为其所固有的对于自然的权利，并赋予一种权力。至于如何运用，自有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加以管理。

休 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大卫·休谟是著名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哲学和哲学史上,休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康德承认,休谟的哲学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也非常推崇休谟,在英美世界中,休谟与洛克、康德齐名,影响巨大。

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11岁进爱丁堡大学,14岁或15岁离校,以后在家自修,专攻哲学。在官场生涯中,他在使馆工作过,出任过英国副国务大臣。在法国期间,结识了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与卢梭也关系亲密。

在哲学上,休谟是一位怀疑论者,他否认有因果必然性。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解研究》(1748)、《自然宗教对话录》、《英国史》等。

在18世纪,英国著名人物对中国的论述并不多,这里所选的休谟有关中国的散论对我们而言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中国的科学进步为何如此缓慢^①

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它们能成熟到比它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语言,用同一种法律治理,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②

① 选自《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进步》,见《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杨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47—48页。标题系编者所加。——编者注

②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则同中国人的优良文化协调起来呢?中国人一直由君主统治着,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的,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的。这是因为中国有如下的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的,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无力镇压广大乡村中人数极其众多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器,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的君主政权能抵御外敌并能保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平和与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